

汉晋玻璃耳珰研究^{*}

任昱勃 温睿^①

内容提要 玻璃耳珰是我国汉晋时期流行的一类饰品，常用作女性耳饰。在东北、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岭南四个区域，玻璃耳珰的流行时间、种类等具有不同特征，但也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汉代可能存在铅钡玻璃耳珰和钾玻璃耳珰两种耳珰的制作体系，黄河中上游为铅钡玻璃耳珰制作体系的中心区域，而钾玻璃耳珰和长玻璃耳珰的制作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和岭南地区。在汉王朝统一政权及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背景下，东汉时玻璃耳珰制作、传播规模扩大，使用趋于普遍，区域性差异缩小。

关键词 汉晋 玻璃耳珰 造型 时空分布 化学成分

一 前言

耳珰，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是一类耳饰，以陶、骨、玉石、水晶等为主要材质，出土数量较少，不及耳珰普及^②。两汉时，耳珰数量激增，成为汉文化区域最流行的一类耳饰，除少量玛瑙、煤精、玉、水晶、金属等材质外，以玻璃质为主，与周邻文化流行的耳环、耳坠等耳饰的形质有显著区别。魏晋南北朝之后，玻璃耳珰几乎消失不见，该种耳饰在我国也逐渐难觅踪迹。

玻璃耳珰是汉魏时期我国独有的一类玻璃制品，是我国传统耳饰造型与非传统材质相结合的制品。战国时期我国的玻璃制品无论器形还是化学成分都已显现出本土特色，汉朝玻璃制造承袭了战国的传统，得到进一步发展，玻璃耳珰是该时期出土数量多且分布广泛的一类玻璃制品，素面无纹饰，常见蓝色。研究玻璃耳珰对认识我国传统耳饰与两汉时期我国本土玻璃的制造传播等都有积极意义。

随着学界对我国古代首饰研究的增多，对耳珰，尤其是汉魏时期的耳珰的关注日益增加。近几年也出现了针对汉魏耳珰的专门研究^③，对汉魏耳珰造型、使用、文化内涵等的认识逐渐深入，推测该时期主要有直接穿耳、穿耳系珠和系于簪首三种耳珰佩戴方式。因材质特殊且数量较多，玻璃耳珰被特别关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藏阿里象泉河流域早期金属时代出土珠饰生产、流通与文化互动研究”(项目编号: 22BKG023)与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汉晋时期新疆东部地区古代玻璃珠研究”(项目编号: 24JK023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温睿系本文通讯作者，电子邮箱: rwen80@163.com。

② 李芽《中国古代耳饰研究》，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2页。

③ 闫淑敏《汉魏六朝女性耳珰研究》，北京服装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注，目前已有研究基本集中在玻璃耳珰造型分类与化学成分分析上。关善明^{〔1〕}、赵启杰^{〔2〕}等对汉代玻璃耳珰造型进行了专门分类，此外也有针对广西^{〔3〕}、湖南^{〔4〕}和广州^{〔5〕}出土玻璃耳珰的类型学研究。目前已发表的近100枚玻璃耳珰的化学成分数据，零散见于对特定地区或特定时期古玻璃研究的论文中，我国玻璃耳珰所属化学成分体系已较为清晰。李青会^{〔6〕}等人还对个别地区出土玻璃耳珰的来源和传播路径进行了讨论，对认识汉代玻璃耳珰的制造及传播等提供了有益参考。

不过，已有玻璃耳珰的造型分类还不够全面，我国玻璃耳珰的整体的时空分布、制作传播情况等也不甚清晰。本文收集已发表的中国古代玻璃耳珰出土信息，在已有关于玻璃耳珰的造型分类基础上，对玻璃耳珰造型进行更全面的分类，并分析玻璃耳珰时空分布特征、流行特点等。再将之前只做单独研究的造型和化学成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基于已有对中国古玻璃的认识，分析玻璃耳珰生产与传播的整体情况。

二 主要发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中国已出土玻璃耳珰约1050件，出土于约590处墓葬和遗址，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北地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等。

（一）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今辽宁省中南部约55座墓葬和遗址及北京市房山区岩上墓葬区出土了少量玻璃耳珰，这些地区主要属汉幽州刺史部。最早的一件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辽宁省抚顺市莲花堡遗址出土的“八面柱体，下部外缘似圆盘”玻璃耳珰^{〔7〕}，其余玻璃耳珰基本为汉代，其中能进一步细化时代的，多数为新莽至东汉时期，少数为西汉时期。东北地区半数玻璃耳珰都出土于大连市，其余有半数出土于辽阳市（汉辽东郡郡府）。辽阳市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出土的玻璃耳珰已知1件为柱状、较粗，还有2件身部细棱柱状、一端宽于身部呈喇叭形^{〔8〕}。前一种造型东北地区只见这一例，后一种与莲花堡遗址出土的相似，该造

〔1〕 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页。

〔2〕 赵启杰、后晓荣《汉代玻璃耳珰相关问题探析》，《苏州文博论丛》总第9辑，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6—14页。

〔3〕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36—140页。

〔4〕 高至喜《长沙汉墓出土喇叭形器研究》，载陈建明主编《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八辑，岳麓书社，2012年，第367—275页。

〔5〕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28—132页。

〔6〕 李青会、董俊卿、赵虹霞等《浅议中国出土的汉代玻璃耳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7—24页。

〔7〕 王增新《辽宁抚顺市莲花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6期，第286—293页。

〔8〕 李文信《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119—126页。

型玻璃耳珰主要出土于西汉时期。东北地区西汉时还有“亚腰”的“腰鼓状”“喇叭状”玻璃耳珰，这是该地区，尤其东汉时期最常见的玻璃耳珰造型。

（二）黄河流域

1. 黄河上游

黄河上游今甘肃、青海、宁夏和内蒙古地区出土较大量玻璃耳珰，主要分布于甘肃省中部、青海省东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这些地区在西汉时属凉州刺史部、朔方刺史部和并州刺史部雁门郡，东汉时则属凉州刺史部和并州刺史部，都在汉朝管辖范围内。因陕北两汉时先后属朔方刺史部和并州刺史部，故将陕北地区纳入黄河上游讨论。

黄河上游甘青宁地区约65座墓葬出土了较多玻璃耳珰。最早的一件为甘肃省永昌县蛤蟆墩沙井文化墓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近圆筒状玻璃耳珰^①，其余基本为汉代，能细化时代的基本为西汉中晚至东汉时期，又以新莽至东汉时期的占大多数。

甘肃省武威市磨咀子汉墓群约10座东汉早中期墓出土了玻璃耳珰25件，该墓群葬者有的标明籍贯，皆为内地迁移而去^②。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22座墓出土了玻璃耳珰35件，形状多样：“T”形9件（7件西汉中晚期，新莽和东汉早中期各1件）；“蘑菇形”1件（新莽时期）；其余为“喇叭形”和“束腰柱形”（基本为东汉时期）^③。该墓群不少墓葬在西汉昭宣之后，显示出以汉文化为主体，又包括其他多种民族因素的文化面貌。青海省民和县胡李家汉墓群5座墓出土玻璃耳珰15件，属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东汉墓M1人骨经初步鉴定，3具皆具欧罗巴人种特征，不过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等来看，已基本汉化。已知形状的玻璃耳珰8件，其中1件新莽时期的“不规则圆锥形”（M6：14）除形状与其他“束腰柱形”不同，器表还有金黄色附着物^④。类似表面有金黄色附着物的玻璃耳珰，在甘肃省庄浪寺角洼汉墓也出土了1件，为“束腰喇叭口状”（M5：2），残留有包金痕迹^⑤。另外，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汉高平城旧址北部北塬一带出土玻璃耳珰也较多，西汉晚至东汉中期，造型相似，皆束腰，两端大小不等^⑥。黄河上游其余已知造型的玻璃耳珰基本似此形状。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第205—237页。

② 陈贤儒《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年第9期，第15—28页；赵吴成《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M25)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11期，第33—39页。

③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64页。

④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博物馆《青海民和县胡李家汉墓2001年至2004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9年第5期，第15—28页。

⑤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庄浪寺角洼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9期，第4—14页。

⑥ 耿志强《宁夏固原北原东汉墓》，《考古》1994年第4期，第334—337页；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5年第2期，第28—40页；樊军《宁夏固原市北塬东汉墓》，《考古》2008年第12期，第23—38页。

黄河上游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5个汉墓群出土了约20件玻璃耳珰。除包头市召湾汉墓群出土东汉早期、晚期5件“束腰呈喇叭口状”玻璃耳珰^①，其余玻璃耳珰均为西汉中晚至东汉早期，已知形状的除4件“钉状”，其余都为“蘑菇状”。陕西省米脂县卧虎湾西汉中期M155也出土了1件似“蘑菇状”的玻璃耳珰^②。

2. 黄河中游

黄河中游今陕西省中部和河南省中西部出土较大量玻璃耳珰，这些地区主要属汉司隶校尉部和豫州刺史部颍川郡。河南省西南部出土玻璃耳珰的地区属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但汉代南阳郡文化风俗近豫州之处^③，可将南阳地区归入黄河中游。安徽省淮河以北出土玻璃耳珰的地点属豫州刺史部或文化风俗近豫州之处^④，亦纳入黄河中游讨论。

黄河中游约110座墓出土玻璃耳珰，以西安市和洛阳市两地出土的玻璃耳珰数量较多。最早的为河南省淅川县全岗遗址战国晚至秦M81出土的3件“细圆柱形，顶端钉帽状”的玻璃耳珰^⑤，其余都为汉代，绝大多数为新莽至东汉时期。西汉玻璃耳珰只有约10件，1件“锥形，一端有圆帽”^⑥，1件“细腰喇叭形”，2件“上端锥状下端珠状”，后两种造型玻璃耳珰均出土于洛阳烧沟汉墓群^⑦，其余为“束腰喇叭形”和“细腰腰鼓状”。洛阳烧沟汉墓群除上述西汉的，还出土了5件新莽至东汉早期的“上端锥状下端珠状”玻璃耳珰及约9件东汉早中期的“细腰喇叭形”玻璃耳珰。黄河中游其他西汉之后的墓葬出土玻璃耳珰已知形状的，皆呈两端大中间细的束腰柱形或束腰喇叭形。

3. 黄河下游

黄河下游今山东省约15座墓出土了极少量的玻璃耳珰，都为东汉时期，当时属青州刺史部和徐州刺史部东海郡，均属“亚腰圆柱形”“体近喇叭形”，造型基本相似。

（三）长江流域

1. 长江上游

长江上游今重庆市中东部、四川省中东部、贵州省中西部和云南省北部主要属汉益州刺史部，已有约

① 魏坚编著《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248页；孙进己、冯永谦、苏天钧编《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9》，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6页。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陕西米脂卧虎湾战国秦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3期，第3—49页。

③ 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7期，第81—87页。

④ 前揭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第81—87页。

⑤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局《河南淅川县全岗遗址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的发掘》，《考古》2019年第11期，第30—48页。

⑥ 齐雪义、刘文阁、程宇鹏等《河南淅川马川墓地汉代积石积炭墓的发掘》，《考古学报》2014年第2期，第237—286页。

⑦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编《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35页。

110座汉至六朝墓葬出土较大量玻璃耳珰。重庆市中东部沿长江一带出土玻璃耳珰的墓葬密集，出土玻璃耳珰数量较多，特别是万州区，长江上游约1/3玻璃耳珰都出土于此。贵州省清镇出土玻璃耳珰墓葬也较多，其中有西汉至东汉初的墓葬^{〔1〕}。此外，长江上游能细化时代的玻璃耳珰皆为新莽至六朝时期，其中东汉的占大多数，明确为六朝时期的21件。已知造型的玻璃耳珰绝大多数形状相近，呈“束腰圆柱形”“腰鼓形”和“似喇叭形”，另有两端或一端凸出柱径，身部呈直筒圆柱状的玻璃耳珰，该造型玻璃耳珰新莽至六朝时期均有出土。

2. 长江中游

长江中游今湖南省及湖北省大部分地区属汉荆州刺史部，出土了大量玻璃耳珰。其周边重庆市巫山县、广东省韶关市、湖北省十堰市、陕西省汉中市也出土玻璃耳珰，前两地属汉荆州刺史部，后两地虽属益州刺史部汉中郡，但汉代汉中郡文化风俗近荆州^{〔2〕}，皆可纳入长江中游一并讨论。

长江中游约155座汉至唐代墓葬出土玻璃耳珰，出土墓葬多半分布于湖南省长沙市和湖北省巴东县、秭归县，三地出土共占长江中游玻璃耳珰总数的约60%。此外，巫山县出土玻璃耳珰数量也较多。长江中游明确为西汉的玻璃耳珰有7件，出土于上述4个市县，皆为西汉中晚期，呈束腰柱状。湖北省秭归县、巴东县等出土约20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玻璃耳珰，大多呈“管状束腰”“喇叭状”，个别“矮圆柱状”。巴东县义种地墓群3座隋唐墓出土1件“较粗直筒状”和4件“喇叭状”玻璃耳珰^{〔3〕}。巴东县茅寨子湾唐代早期墓DM1出土1件“束腰管状”玻璃耳珰^{〔4〕}。长江中游其余能明确时代的玻璃耳珰都为新莽和东汉时期，又基本为东汉时期；已知形状的，主要为“亚腰形”“束腰柱形”“喇叭形”，另有个别“直筒状”，及湖南省衡阳市茶山坳东汉晚期M11出土的2件身部细长圆柱，一端突出呈喇叭形的^{〔5〕}。

3. 长江下游

长江下游今江西省、浙江省、江苏省及安徽省淮河以南地区约25座墓出土极少量玻璃耳珰，基本为新莽至东汉时期，当时主要属扬州刺史部。已知形状的玻璃耳珰呈“喇叭形”“腰鼓形”“束腰圆管形”，只浙江省海盐县龙潭港东汉初M6出土的一件不同^{〔6〕}，形如河南省淅川县的“锥形”玻璃耳珰。

（四）岭南地区

广西省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中南部出土少量玻璃耳珰，这些地区属西汉交趾刺史部，东汉交州刺史

〔1〕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至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第207—211页。

〔2〕 前揭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第81—87页。

〔3〕 湖北省文物局三峡办、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巴东义种地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第18—40页。

〔4〕 朱世学、周百灵编著《三峡湖北库区墓葬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97页。

〔5〕 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衡阳茶山坳东汉至南朝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6期，第1079—1093页。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浙江海盐龙潭港遗址汉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2005年第1期，第25—32页。

部。出土玻璃耳珰的墓葬较集中，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合浦县及广东省广州市。岭南玻璃耳珰都为两汉时期，能明确时代的，5件为西汉时期，其余均为东汉时期。已有对该地区玻璃耳珰造型的分类研究^{〔1〕}，造型如上述地区的“腰鼓形”“束腰柱状”和“喇叭形”等。

（五）其他地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普拉魏晋时期墓84LSIM49出土1件亚腰圆筒状玻璃耳珰^{〔2〕}。河北省鹿泉西龙贵东汉晚期M69出土1件玻璃耳珰，造型不同于已发现的其他玻璃耳珰。出土墓地的葬者可能都属于当地平民中的富裕者，也许有个别下层官吏^{〔3〕}。

三 造型与分类

玻璃耳珰造型较为多样，根据身部形状，可分为直腰(甲类)和收腰(乙类)两大类。直腰玻璃耳珰身部直径无变化，而收腰玻璃耳珰两端向中部内收，身部呈束腰状。这两大类玻璃耳珰又可据端部形状继续细分。

直腰玻璃耳珰可分为柱形(甲A类)和丁头形(甲B类)两类。

柱形(甲A类)身部较粗，圆柱状，一般一端凸出柱径，宽于身部，与身部分界明显，多为蓝色，极少量绿色。中穿孔，长度多在1.5—2厘米间。如贵州省黔西汉墓出土1枚(M37：8)，浅蓝半透明，高1.8厘米〔图一〕^{〔4〕}。该类玻璃耳珰于西汉东北地区出土1枚，之后于长江中上游，新莽至六朝出土更多，及至隋唐时期还发现1枚。柱形玻璃耳珰时空分布跨度较大，但主要分布于西汉以后的长江中上游，流行时间较其他类玻璃耳珰晚。

丁头形(甲B类)身部较细，圆柱或棱柱状，一端宽于身部，多呈喇叭状或平似圆盘，剖面为“T”形，常见蓝、绿色，偶见红色。部分有穿孔。长度变化大，1—5.2厘米间不等。如青海省上孙家寨汉晋墓出土1枚，身部圆柱状，大端似圆盘〔图二：1〕，长1.8厘米^{〔5〕}；辽宁省辽阳市苗圃墓地出土1枚，身部棱柱

〔1〕 前揭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第136—140页。前揭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第128—132页。

〔2〕 王博、鲁礼鹏《扎滚鲁克和山普拉古墓出古代玻璃概述》，载干福熹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6—1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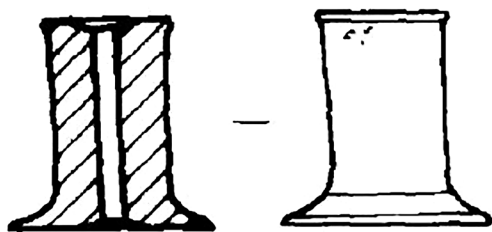
〔3〕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物保护所《河北鹿泉西龙贵汉代墓葬》，《考古学报》2013年第1期，第111—146页。

〔4〕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黔西县文物管理所《贵州黔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8期，第40—56页。

〔5〕 前揭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上孙家寨汉晋墓》，第16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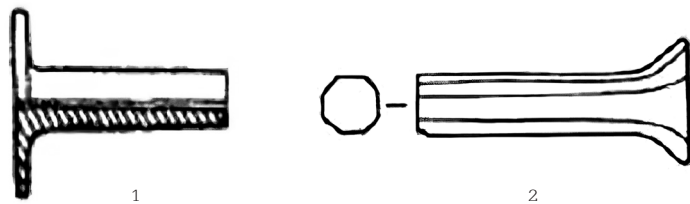
〔图一〕柱形玻璃耳珥

贵州省黔西汉墓M37出土
采自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黔西县文物管理所《贵州黔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8期，第54页



〔图二〕丁头形玻璃耳珥

1. 青海省上孙家寨M96出土 采自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65页
2. 辽阳市苗圃M80出土 采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辽阳市苗圃墓地汉代土坑墓》，《考古》2015年第4期，第64页



状，大端喇叭状〔图二：2〕，长2.8厘米^{〔1〕}，东北地区已发现的该类玻璃耳珥身部基本为棱柱状。丁头形玻璃耳珥存续时间较长，分布区域也较广，不过大多为东汉之前，此时在黄河中上游和东北地区出土，东汉时长江中下游才零星发现。

收腰玻璃耳珥可分为收腰圆筒形(乙A类)、蘑菇头形(乙B类)和尖喇叭头形(乙C类)三类。

收腰圆筒形(乙A类)两端都较身部粗，两端向身部逐渐内收，整体呈束腰状。几乎都纵穿一圆孔，孔径大多在0.1—0.2厘米间，个别0.3—0.4厘米。常见蓝色，极少量绿色，偶见黑、白、紫色等。端面平或内凹，内凹的端面边沿留有平棱，有些窄缘，有些宽沿。一般一端内凹一端平，但也有两端都内凹或都平的情况。有的两端直径相近，身部最细处在耳珥中部，整体基本上下对称，形状较规则，如西安市尤家庄出土1枚〔图三：1〕^{〔2〕}。有的大端向身部内收明显，而小端收势较缓，身部除近大端处直径变化不明显，形似喇叭，如安徽省淮北市出土1枚〔图三：2〕^{〔3〕}。其余的外形不似上述的规则或明显似喇叭，如贵州省平坝县夏云镇〔图三：3〕^{〔4〕}和湖北省巴东县焦家湾〔图三：4〕^{〔5〕}出土的。考古报告中常描述此类为“束腰柱形”“喇叭形”“腰鼓形”“亚腰”等。该类玻璃耳珥战国至魏晋南北朝都有发现，及至隋唐还发现5枚，流行时间长，数量多，分布范围广，是最流行的一类玻璃耳珥。岭南和黄河下游目前只见该类玻璃耳珥。

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珥长度基本在0.7—3厘米间，变化较大，可按长度分为两类。a类(乙Aa类)长度在1.9厘米以下，较短，绝大多数长与大端径相近，外形粗短，可称为短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珥(后文简称“短玻璃耳珥”)。b类(乙Ab类)长度在1.9厘米及以上，长与大端径相差较大，外形瘦长，可称为长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珥(后文简称“长玻璃耳珥”)。不同地区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珥中短、长玻璃耳珥的相对数量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辽阳市苗圃墓地汉代土坑墓》，《考古》2015年第4期，第53—66页。

〔2〕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尤家庄六十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第42—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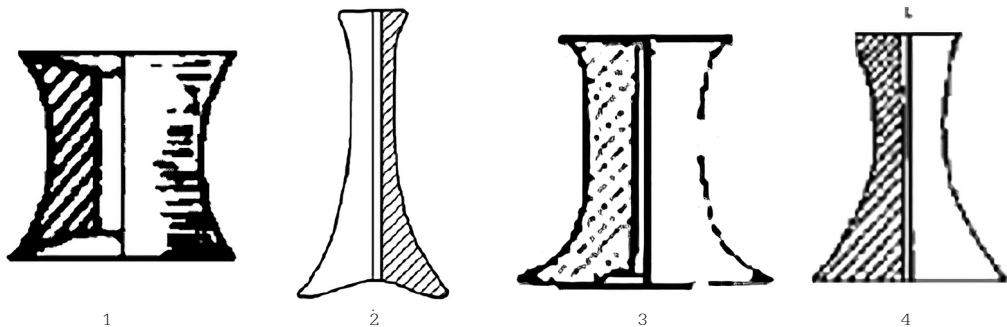
〔3〕 淮北市博物馆《安徽淮北市人民医院住院部古墓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7年第4期，第3—16页。

〔4〕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坝县文化局《贵州平坝县夏云镇汉墓的发掘》，《考古》2017年第1期，第61—67页。

〔5〕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湖北巴东县五里堆、焦家湾、镇江寺墓群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9年第4期，第32—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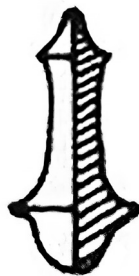
〔图三〕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

1. 西安市尤家庄M67出土 采自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尤家庄六十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第53页
2. 安徽省淮北市M5出土 采自淮北市博物馆《安徽淮北市人民医院住院部古墓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7年第4期，第15页
3. 贵州省平坝县M78出土 采自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坝县文化局《贵州平坝县夏云镇汉墓的发掘》，《考古》2017年第1期，第66页
4. 湖北省巴东县M6出土 采自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湖北巴东县五里堆、焦家湾、镇江寺墓群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9年第4期，第38页



〔图四〕蘑菇头形玻璃耳珰

- 青海省胡李家汉墓群M6出土 采自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回族自治县博物馆《青海民和县胡李家汉墓2001年至2004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9年第5期，第18页



〔图五〕尖喇叭头形玻璃耳珰

- 河北省鹿泉西龙贵M69出土 采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物保护所《河北鹿泉西龙贵汉代墓葬》，《考古学报》2013年第1期，图版陆：8



及长玻璃耳珰长度特征有所不同，下文详述。

蘑菇头形(乙B类)大端半圆球状突出，小端尖状突出，身部微束，中无穿孔。形状及尺寸变化不大，长度多在1.8—2.2厘米间，常见白、蓝色，偶见绿色。如青海省胡李家汉墓群出土1枚(M6：14)，宝石蓝色，长1.9厘米〔图四〕^{〔1〕}。该类玻璃耳珰时空分布较集中，主要出土于黄河中上游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墓葬中。

尖喇叭头形(乙C类)一端较大，端面内弧，呈喇叭形，小端尖状突出，身部微束，中有穿孔。该造型耳珰目前只见玻璃质，只河北省鹿泉西龙贵考古出土的一枚(M69：2)可确定为此形状，深蓝泛绿色，高2.1厘米〔图五〕^{〔2〕}。从出土数量看，该类玻璃耳珰在当时极为稀有，但从墓主身份看，该类玻璃耳珰并不算珍贵难求。所以，尖喇叭头形玻璃耳珰的稀少可能与制作成本无关，而与人们的喜好等主观因素有关。

四 玻璃耳珰的时空分布特征

我国玻璃耳珰的发展可大致分为战国、两汉和魏晋南北朝三大阶段。两汉是玻璃耳珰出土数量和地点最多、最为流行的时期，出土玻璃耳珰约980枚，除约100枚只知为汉代，其余都能进一步细化时代，可进一步分为西汉、新莽至东汉两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玻璃耳珰的分布、数量与造型等具有不同特征。

战国时，黄河中上游已出土数枚玻璃耳珰，东北地区出土一枚战晚至西汉初的玻璃耳珰。此时玻璃

〔1〕 前揭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回族自治县博物馆《青海民和县胡李家汉墓2001年至2004年发掘简报》，第15—28页。

〔2〕 前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等《河北鹿泉西龙贵汉代墓葬》，第111—146页。

耳珰数量稀少，分布范围有限，但造型较丰富，有收腰圆筒形和丁头形两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还收藏一枚战国的黄色蘑菇头形玻璃耳珰。

西汉时，黄河中上游和东北地区较前期出土玻璃耳珰数量增多，范围扩大，长江中游和岭南地区也都出土了数枚玻璃耳珰，长江上游可能存在玻璃耳珰。目前明确为西汉时期的玻璃耳珰有51枚，其中能进一步明确时代的基本为西汉中晚期。此时期玻璃耳珰造型种类丰富，除尖喇叭头形外的玻璃耳珰种类都有发现。黄河中、上游共25枚，都有收腰圆筒形、丁头形和蘑菇头形三类，不过上游丁头形占多数，中游收腰圆筒形稍多。东北地区14枚，收腰圆筒形和丁头形数量相当，还有1枚柱形。长江中游和岭南地区此时只见收腰圆筒形。另外，黄河中上游和东北地区还有约30枚西汉晚至新莽或西汉中晚至东汉的玻璃耳珰，已知造型的包括20枚收腰圆筒形、8枚蘑菇头形和1枚丁头形。

新莽至东汉时期，前期发现玻璃耳珰的地区仍有出土，且出土墓葬较前期明显增多，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也发现了极少量的玻璃耳珰。此时期玻璃耳珰数量激增，共约790枚，其中东汉的约715枚。相较前期，东北地区不见柱形，而长江中上游有所发现，且数量增加；黄河中游不见丁头形，黄河上游和东北地区的数量有所减少，不过长江中下游零星发现；新的玻璃耳珰种类——尖喇叭头形玻璃耳珰出现。该时期玻璃耳珰数量达前期10倍之多，种类也更丰富，不过，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占比远高于前期，其他类玻璃耳珰仅有约22枚，收腰圆筒形可谓一枝独秀。

魏晋南北朝时长江中上游出土了约40枚玻璃耳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普拉墓地发现的一枚很可能由中原传入。此时造型仍以收腰圆筒形为主，另见数枚柱形。还有约25枚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玻璃耳珰，已知造型的都为收腰圆筒形。

总体来看，玻璃耳珰于战国时零星出现，西汉时出土数量和范围有一定程度增加，西汉初还不常见，至西汉中晚期才开始流行，主要流行于黄河中上游及东北地区，这两个区域玻璃耳珰数量较多，流行种类丰富。新莽至东汉时期，玻璃耳珰数量较前期激增，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种类更为丰富，是玻璃耳珰的盛行期。东北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玻璃耳珰种类及相对数量较前期发生一定变化，各区域玻璃耳珰种类仍不完全相同，但都以收腰圆筒形最流行。魏晋南北朝时玻璃耳珰数量骤降，在长江中上游极少量出土，之后则归于沉寂。

我国出土玻璃耳珰的种类与数量统计见[表一]。综合来看，东北地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岭南四个区域玻璃耳珰的流行时间与流行种类不甚相同，但也呈现出相似性。时间上，东北地区玻璃耳珰可能从战国时出现，流行于西汉，东汉时更为流行；黄河流域玻璃耳珰自战国时零星出现，西汉时开始流行，新莽至东汉时盛行；长江流域玻璃耳珰自西汉时出现，新莽至东汉盛行，直到魏晋南北朝仍有极少量发现；岭南地区玻璃耳珰西汉出现，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四个区域玻璃耳珰出现时间或长或短、或早或晚，但都在东汉时最为流行。种类上，东北地区常见收腰圆筒形和丁头形两类，另见1枚柱形，为西汉时期；黄河流域玻璃耳珰种类最丰富，除柱形玻璃耳珰，其余种类都有发现，其中丁头形主要流行于东汉以前；长江流域除东汉出现个别丁头形，只见收腰圆筒形和柱形两类，后者流行于新莽至六朝时

期；岭南地区目前只见收腰圆筒形。东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的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在西汉时同本区域其他类玻璃耳珰数量相当，东汉时与长江流域一样，成为本区域占比极大的一类。可见，四个区域同一时期出现的玻璃耳珰种类不完全相同，但都一直流行收腰圆筒形，且在东汉时最为流行。不过，不同地区此类玻璃耳珰的长度特征不甚相同。

[表一] 中国出土玻璃耳珰种类与数量统计表（单位：件）

出土地区 造型分类	东北地区	黄河上游	黄河中游	黄河下游	长江上游	长江中游	长江下游	岭南地区	其他地区
柱形	1	0	0	0	11	6	0	0	0
丁头形	8	15	4	0	0	2	1	0	0
收腰圆筒形	64	99	152	20	119	211	30	71	1
蘑菇头形	0	13	7	0	0	0	0	0	0
尖喇叭头形	0	0	0	0	0	0	0	0	1
未知形状	15	49	36	0	52	66	3	0	0
总数	88	176	199	20	182	285	34	71	2

统计各地区已知长度的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发现，黄河上游短玻璃耳珰占比高达81%，长玻璃耳珰长度都在2.2厘米及以下，此地短玻璃耳珰颇为流行，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整体偏短。黄河中游和长江上游情况类似，两地短玻璃耳珰占比分别为75%和68%，长玻璃耳珰长度大多在2.2厘米及以下。而长江中游短玻璃耳珰占40%，长玻璃耳珰中约半数长度在2.2厘米以上，长玻璃耳珰稍多，普遍较长。长江下游短玻璃耳珰只占15%，长玻璃耳珰绝大多数长于2.2厘米，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普遍更长。东北地区、黄河下游和岭南地区短玻璃耳珰占比分别为64%、45%和63%，前两个地区长玻璃耳珰长度都在2.2厘米及以下，而岭南地区的约1/3长于2.2厘米，特别的是，该地区东西两地长、短玻璃耳珰的比例并不一致，广西地区长玻璃耳珰稍多，短玻璃耳珰占44%。总体来看，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上游流行短玻璃耳珰，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普遍较短，而长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江下游，长玻璃耳珰多，且长度偏长，其它地区短、长玻璃耳珰总体无明显数量差异。

五 玻璃耳珰的化学成分特征

受自然资源、科技水平等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制作玻璃所用的原料和工艺有所不同，玻璃制品的器形、纹饰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具有不同特征，所以基于玻璃制品的化学成分和器形特征等，可对其产地进行推测。其中，化学成分，特别是助熔成分，对判别古玻璃制品的来源具有重大指导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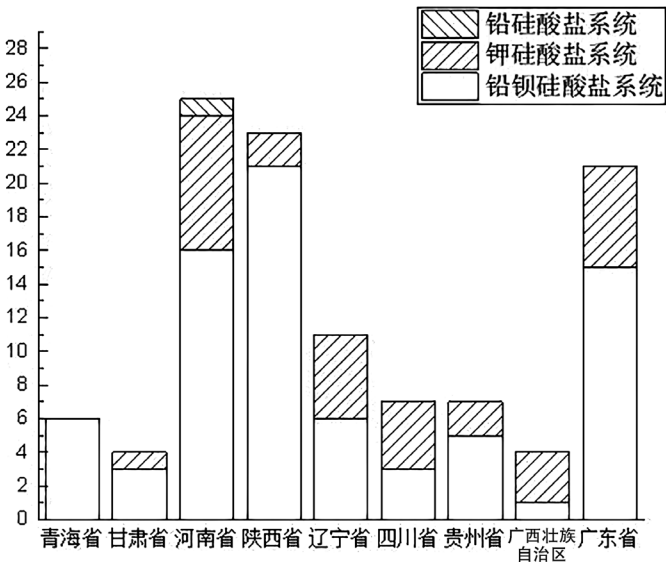
我国出土的古玻璃，按助熔剂的不同，可大致分为以氧化铅为基本助熔剂的铅基玻璃和以氧化钾为

基本助熔剂的钾基玻璃等^{〔1〕}。我国的铅基玻璃中的铅钡硅酸盐系统玻璃，自战国时已有较多发现，这是不同于外国同时期玻璃成分特征的一种玻璃体系，学术界一致认为我国自制的。除化学成分特征，战国时我国玻璃器的器形也显现出自身特色，有较多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玻璃器造型出现。汉代玻璃制造承袭了战国玻璃制造的传统，并进一步发展，此时我国发现玻璃器的数量、地点和种类进一步增加。该时期依然以铅钡玻璃最为常见，其数量多，分布广。此外，战国时只零星出现的钾玻璃此时数量大增，分布范围扩大，与铅钡玻璃的分布有所重合，但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云南省等南方及西南地区为主。南亚、东南亚等地也发现了大量同时期及更早时期的钾玻璃，是钾玻璃的重要产地。

目前只对东北地区、黄河上游、黄河中游、长江上游和岭南地区出土的小部分玻璃耳珰进行了检测分析〔图六〕，基本属铅钡硅酸盐玻璃系统和钾硅酸盐玻璃系统，铅钡玻璃耳珰大量，占65%，钾玻璃耳珰较少。两种成分体系玻璃耳珰在这些地区都有分布，但黄河中、上游大多数为铅钡玻璃耳珰，其占比皆大于75%，东北地区、长江上游和岭南地区铅钡玻璃耳珰稍多，都占60%左右，不过其中广西地区钾玻璃耳珰多，占比达75%。我国玻璃耳珰的化学成分体系及这两类成分体系玻璃耳珰的相对数量与分布，与汉代我国玻璃的整体面貌基本一致。

铅钡玻璃耳珰氧化铅(PbO)含量大多在15%—40%间，氧化钡(BaO)含量在1%—18%间，河南省出土铅钡玻璃耳珰PbO含量基本在5—15%间，其与BaO含量(1—7%)与其他地区的差别较明显，较特殊。钾玻璃耳珰中，氧化镁(MgO)的含量几乎都在1%以下，较低，“低镁”是我国及南亚、东南亚钾玻璃的成分特点，可能是以硝石类含钾矿物作助熔剂的缘故^{〔2〕}。只有广东省钾玻璃耳珰MgO在2%左右，较高，其Na₂O含量也相对较高，为1.8%—2.8%，原料配方较特殊。

〔图六〕已检测中国出土玻璃耳珰的地区及成分体系



〔1〕 赵匡华《试探中国玻璃比例的源流及炼丹术在其间的作用》，《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10期，第145—156页。

〔2〕 史美光、何欧里、周福征《一批中国汉墓出土钾玻璃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6年第3期，第307—313页；黄启善《广西古代玻璃的科学测试与分析研究》，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中国化学会应化委员会考古与文物保护化学委员会、中国科技考古学会(筹)编《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1—97页。

六 相关问题讨论

（一）玻璃耳珰的制作

目前可基本确定玻璃耳珰是我国自制的^{〔1〕}。据玻璃耳珰出土情况，我国战国时已开始玻璃耳珰的制作，西汉时制作规模扩大，但主要集中在北方，东汉时达到高峰，南方也形成一定的制作规模。魏晋南北朝时北方社会动荡严重，人口大量南迁，我国原有玻璃制造业大受打击，玻璃耳珰制作规模骤缩或已不复存在，此时在长江流域发现的极少量玻璃耳珰可能为前朝遗物。

已检测的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共96件，88件有长度数据，综合分析它们的成分体系和长度，发现属铅钡硅酸盐系统的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92%都为短玻璃耳珰，长玻璃耳珰长度都小于2.1厘米；而钾硅酸盐系统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中81%为长玻璃耳珰，长1.9—2.3厘米，短玻璃耳珰长度基本在1.4—1.8厘米间。铅钡玻璃耳珰一般都较短，而钾玻璃耳珰大多较长。可见，两种成分体系的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除助熔成分不同，长度也具有不同特征。由此推测，我国古代玻璃耳珰的制作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体系——铅钡玻璃耳珰制作体系和钾玻璃耳珰制作体系，这两种制作体系在玻璃耳珰助熔剂选择和长度制作上都有所不同，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生产体系，可能存在不同的生产中心。

铅钡玻璃耳珰数量多，且造型丰富：已检测的玻璃耳珰除收腰圆筒形外，2件蘑菇头形、1件丁头形和2件柱形玻璃耳珰皆属铅钡硅酸盐系统，所以铅钡玻璃耳珰制作体系的规模更大。四川省南充市出土的一件柱形玻璃耳珰(M27：2)与同墓出土的一件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M27：4)主要元素含量相近^{〔2〕}，说明同一铅钡玻璃耳珰制造点可能会同时生产多种造型的玻璃耳珰。

黄河上游和黄河中游铅钡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占这两地已检测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总数的80%左右，东北地区、长江上游和岭南地区此比例都在60%左右，各地区的这个比例与上节所述各地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中短玻璃耳珰的占比基本相近，这与上文对玻璃耳珰化学成分体系和短、长玻璃耳珰间关系的认识是相符的。各地区不完全一致的玻璃耳珰种类、各地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的不同长度以及化学成分体系特征，暗示各地玻璃耳珰来源不甚相同，即各地玻璃耳珰的制作及与其他地区的相关交流有所差异。

黄河上游和中游有别于其他地区，短玻璃耳珰占比大，推测可能大多为铅钡玻璃。这两个地区出

〔1〕 前揭李青会等《浅议中国出土的汉代玻璃耳珰》，第17—24页；赵凤燕、陈斌、柴怡《西安出土若干玻璃器的pXRF分析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第111—120页。黄启善《广西北部湾地区汉代玻璃制品的研究》，广西博物馆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广西博物馆协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第七届学术研讨会》，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143—167。

〔2〕 莫洪贵《四川地区出土古代玻璃制品的研究》，载干福熹编《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51页；Fu Xiufeng, Gan Fuxi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ome Ancient Glasses Unearthed in Southern and Southwestern China” in Gan Fuxi, Robert H Brill (eds.), *Ancient Glass Research along the Silk Road*,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9, pp.413-438.

土玻璃耳珰总数大，流行时间早，西汉时流行、东汉时存在的玻璃耳珰种类也都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地区，所以黄河中、上游应该生产玻璃耳珰，并以铅钡玻璃耳珰制作体系为主，生产玻璃耳珰时间较早，种类多样。已有研究认为西汉时形成了以中国中原为主的铅钡玻璃^①，那么黄河中游存在玻璃耳珰制作中心的可能性更大。

黄河上游甘青宁地区玻璃耳珰数量与黄河中游相当，如此数量的玻璃耳珰不排除当地制作的可能。该地玻璃耳珰流行特征与黄河中游的极为相近，两地玻璃耳珰制品或相关技术存在较为密切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青海省和甘肃省有2座墓葬出土了2件不见于其他地区的包金玻璃耳珰。我国新疆、青海、广州等地区汉晋墓中曾出土个别表面包金的玻璃珠，其中青海省上孙家寨汉晋墓出土的一枚经科技分析，被认为很可能通过印度输入我国^②。包金玻璃珠是金箔装饰玻璃珠，即装金玻璃珠的一种类型，装金玻璃珠起源于地中海地区技艺，印度也是其一个重要产地^③。包金玻璃耳珰的发现说明我国汉代可能也制造包金玻璃器。如此稀少且分布集中的包金玻璃耳珰，可能只在一特定制作点进行了极小规模的生产，也许是我国工匠受到外国传入包金玻璃珠的启发，制作了包金玻璃耳珰，但因某些原因未能扩大生产。黄河中、上游还有少量钾玻璃耳珰，可能也是从其他地区传入。

长江中游有不同于其他地区较多的、偏长的长玻璃耳珰，又出土玻璃耳珰总数多，特别是在东汉时期，是出土玻璃耳珰最多的地区，各时期出现的玻璃耳珰种类也与其他地区不完全相同，所以该地区极有可能生产玻璃耳珰，在东汉时形成一定规模。占比较多的长玻璃耳珰为钾玻璃的可能性较大，所以该地区可能存在钾玻璃耳珰制作体系。该地短玻璃耳珰占比并不小，现普遍认为长江流域为古代铅钡玻璃制作中心之一^④，该地区有可能也存在铅钡玻璃耳珰制作体系。至今未见该地区玻璃耳珰化学成分数据发表，本文基于有限的玻璃耳珰化学成分数据对汉代玻璃耳珰制作体系的分析可能尚不全面，不排除该地区有生产铅钡硅酸盐系统长玻璃耳珰的可能。

广西地区钾玻璃耳珰占比大，明显不同于其他已知玻璃耳珰化学成分数据的地区。汉代我国出土的钾玻璃中有很大大一部分都是自制的^⑤，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广西地区居民掌握了玻璃制作技术，能够生产钾玻璃^⑥。广西地区长玻璃耳珰占比也较其他大部分地区多，所以该地可能存在钾玻璃耳珰制作中心。长江上游玻璃耳珰总数大，又有较其他地区相对多的柱形玻璃耳珰，有研究认为其在汉代时拥

① 李青会、张斌、干福熹等《一批中国南方出土古玻璃的化学成分的PIXE分析结果》，载前揭干福熹编《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第80页。

② 史美光、周福征《青海大通县出土汉代玻璃的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0年第2期，第22—26页。

③ 赵德云《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07页。

④ 前揭李青会、张斌、干福熹等《一批中国南方出土古玻璃的化学成分的PIXE分析结果》，第80页。

⑤ 李青会、干福熹、顾东红《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几个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234—247页。

⑥ 前揭黄启善《广西北部湾地区汉代玻璃制品的研究》，第143—167页。

有自主生产玻璃的能力^①，所以不排除长江上游生产玻璃耳珰的可能性。

其他地区的玻璃耳珰可能都为外地输入。长江下游占绝大多数的偏长的长玻璃耳珰很可能源于长江中游。东北地区和黄河下游长、短玻璃耳珰数量相当，这两地与黄河中上游及黄河流域以南地区很可能都存在玻璃耳珰的相关交流。

总体来看，黄河中上游为铅钡玻璃耳珰制作体系的中心区域，西汉时已初具规模，东汉时扩大，生产玻璃耳珰种类丰富。而钾玻璃耳珰和长玻璃耳珰的制作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和岭南地区，西汉以后才形成一定规模，总体规模不如铅钡玻璃耳珰制作体系。黄河中上游外的其他地区，除长江下游，铅钡玻璃耳珰和短玻璃耳珰都不少，占比都在40—70%间，目前无法确定这些地区是否也自制铅钡玻璃耳珰，但不能否认形成时间早、规模不断扩大的黄河中上游铅钡短玻璃耳珰制作中心在相关产品或产品造型、技术等制作方面对这些地区存在一定的输出与影响。同时，其他地区普遍偏高的铅钡和短玻璃耳珰比例反映出，此影响力要强于黄河流域以南区域钾玻璃耳珰和长玻璃耳珰向外的输出程度与影响力，作为汉王朝政治经济中心所在区域，其对王朝其余地区的影响力是相对较强的。

（二）玻璃耳珰的使用

未受扰乱且人骨位置较清晰的墓葬中，玻璃耳珰基本出土于死者骨架周围，是死者生前所用之物，大多发现于颅骨周围和颈侧，有的能明确看出是在耳部，应是一类耳饰，同古文献中“穿耳施珠曰珰”^②等珰为耳饰的记载。但据出土位置，耳珰这一造型器物可能不只用于耳部装饰，个别情况下也被用作项饰、腕饰，如敦煌营盘林场汉墓5件玻璃耳珰“出土时与石珠、珍珠、琥珀珠等以项链的形式摆放在尸体前胸”^③；姜屯汉墓M40南侧人骨的右脚处发现1件玻璃耳珰^④；西宁市杨家寨M1北棺人骨两耳侧出土玻璃耳珰的同时，右手和左小臂处也分别发现4件和1件玻璃耳珰^⑤。也有个别例外情况，上孙家寨汉墓乙M11出土的1件玻璃耳珰放置于两棺前的漆案上^⑥，未随死者入棺。

随葬玻璃耳珰的、能辨别性别的人骨架基本是女性，极个别男性，其中只有姜屯汉墓M10东壁男性随葬的玻璃耳珰可知在头骨两侧^⑦，其余的与死者骨架位置关系不清。也发现两汉时男性头骨两侧出土

① 伏修锋、干福熹《基于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一批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古玻璃成分的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6年第4期，第6—13页。

② （东汉）刘熙、（清）毕沅疏、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第162页。

③ 来源于敦煌市博物馆第一展厅“两汉敦煌的大发展”展示文物“玻璃耳珰”的官方简介。

④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姜屯汉墓(上)》，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99页。

⑤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宁市文物管理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杨家寨汉墓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9年第2期，第20—29页。

⑥ 前揭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上孙家寨汉晋墓》，第46页。

⑦ 前揭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姜屯汉墓(上)》，第19页。

其他质地耳珥的情况。可见耳珥并不仅限于女性佩戴，当时男性也会使用耳珥作耳饰，可能还用作其他装饰。虽多个地区不同时段都有发现，但从比例上看，男性饰耳珥还是罕见现象。

一座墓葬一般出土玻璃耳珥1—2件。2件玻璃耳珥有的明显位于头骨两侧耳部，可见死者生前是双耳佩戴的，头颈处出土1件玻璃耳珥的现象说明当时也单耳佩戴耳珥。出土1件玻璃耳珥的墓葬数量是出土2件的1.5倍左右，单耳佩戴的方式可能更流行些。不过，不排除随葬1件玻璃耳珥只是为象征死者生前佩戴耳珥这一行为，而未完全还原生前佩戴的数量。出土玻璃耳珥的墓葬中，只有约7%的墓葬出土玻璃耳珥数量逾2件，它们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中上游地区，前一地区一墓出玻璃耳珥5—10件，后一地区一墓出3—5件，稍少。其中很多为多人合葬墓，单人随葬数量可能不达如此之多。因较多墓葬尸骨腐朽严重或被破坏，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最终能确定为单人随葬2件以上玻璃耳珥的，除上文提到的用作项饰和同时作耳、腕饰的情况，还有如白银市黄湾M4^{〔1〕}和酒泉市下河清M8^{〔2〕}，分别出土5件、7件玻璃耳珥，都位于女骨头部周围。这么多玻璃耳珥可能不会同时佩戴，目前看来与死者阶级、财力无较大关系，可能只是死者生前喜爱玻璃耳珥，拥有多件。

单人随葬2件及以上玻璃耳珥的，玻璃耳珥几乎都为同一造型、颜色，玻璃耳珥也极少与其他质地耳珥同出一墓，只有甘肃省临泽县沙河汉晋墓地M2东棺人架头骨两侧分别出土1件玻璃耳珥和1件炭精耳珥^{〔3〕}，确定为同一人随葬不同质地耳珥，它们颜色不同，但造型大小相似。可见当时人们注意佩戴耳珥造型、颜色的一致性，注重整体的统一。

（三）玻璃耳珥的传播与流行

随着汉朝对北方、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经略，玻璃耳珥分布范围进一步向汉边疆扩大。经移民屯垦，宣帝时，北方边郡的建设已初具规模，玻璃耳珥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流行的时期，正是该地文化交融、和平繁荣发展的时期。青海省的玻璃耳珥目前都出土于河湟谷地，此地秦时为羌、小月氏杂居区，汉宣帝在此实施屯田政策后，汉族人口源源移入，汉文化与当地文化不断交融。此地孙家寨和胡李家两处文化面貌丰富的汉墓群出土玻璃耳珥较多，还有数枚煤精耳珥，基本不见游牧民族流行的耳饰种类，可见当地人群在汉时的耳饰佩戴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贵州省也出土不少玻璃耳珥。不过当时其他“西南夷”地区，即云南省和四川省西部高原，以及西域几乎未见耳珥身影，这两个地区的人群保持着佩戴耳块与耳环、耳坠等耳饰的传统。

出土玻璃耳珥墓葬多且密集的地区，大多政治经济繁荣、对外交往频繁，比如西安、洛阳及辽阳、大连、固原、长沙、贵港、合浦、广州等都是汉朝或当时各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黄河上游甘青宁地区发现玻

〔1〕 白银市文物局、平川区文化体育和广播影视局《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黄湾汉代木椁墓清理简报》，《形象史学研究》总第3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1页。

〔2〕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酒泉县下河清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2期，第55—56页。

〔3〕 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临泽县博物馆《甘肃临泽沙河汉晋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7期，第42—59页。

璃耳珰的地点基本在丝绸之路沿线，该地玻璃耳珰制品或相关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与黄河中游交流密切。湖北省巴东县出土玻璃耳珰数量多，出土频率较高，是玻璃耳珰颇为流行的地区。其东秭归县向西沿长江至重庆市忠县一带，出土玻璃耳珰都较多，金属质耳环数量也明显多于其它地区，可见汉晋时这一带较为流行佩戴耳饰。而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出土玻璃耳珰极少，流行时间较短，其他质地耳珰和其他耳饰都极不常见，可见当时这两个地区的人们并不流行佩戴耳饰。

出土玻璃耳珰的墓葬中有较少可辨别墓主身份，大都是官吏和地主阶层，还有较少的平民，几乎无贵族，可见玻璃耳珰在民间流行，拥有玻璃耳珰的主要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的官僚和地主。不过近半数都是低级官吏和小地主，这与平民墓出土玻璃耳珰的现象可以说明，汉代玻璃耳珰的使用已趋向大众化。当时其他质地耳珰数量普遍极少，分布范围有限，煤精、骨、玉、水晶、铜、陶耳珰主要见于北方，玛瑙、琥珀、红玉髓、金、银、石等耳珰基本只见于南方，其中玛瑙耳珰稍多，但主要分布于岭南。相较而言，玻璃耳珰是极为流行的，其颜色鲜艳、色泽光润，装饰性好，在当时受人们喜爱。同时，汉代玻璃制造业取得了一定发展，玻璃耳珰制作成本较低，价格不高，使玻璃耳珰的普遍使用成为可能。

西汉时玻璃耳珰主要分布于北方，南北方流行的玻璃耳珰种类差异大，区域性特征较明显。至东汉时，玻璃耳珰数量激增，传播范围变广，在全国广泛流行，这与汉王朝统一的中央政权统治、因开拓边疆人员流动增强，以及西汉晚期、东汉时较宽松的工商业政策使商业逐渐兴盛^{〔1〕}等都有一定关系。此时各区域出现的玻璃耳珰种类仍不完全相同，但都以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最为流行。玻璃耳珰流行种类趋于一致，南北方差异的缩小，可能是东汉时商贸、人群流动等活动变得频繁、地区间交流联系不断加强的另一结果。

七 结语

两汉时期，耳珰是我国流行的一类饰品，又以玻璃质耳珰生产传播规模最大、最受欢迎。玻璃耳珰主要用作女性耳饰，双耳佩戴，也可能单耳佩戴，偶作项饰、腕饰，也有男性使用；其造型多样，不过当时人们若佩戴多件，一般会选择相似造型和颜色的耳珰，注重整体一致性。玻璃耳珰在战国时已零星出现，流行于汉晋时期，之后便难觅踪迹，具体于西汉时开始流行，东汉时盛行，魏晋南北朝时衰落。不同时期，玻璃耳珰的分布略有不同，各区域玻璃耳珰种类及各类相对数量也发生了变化。总体来看，玻璃耳珰流行时间与流行种类在东北地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区域差异至东汉时缩小，表现为四个区域的玻璃耳珰都于此时盛行起来，且都以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最为流行，只是不同地区该类玻璃耳珰的长度具有不同特征。

综合分析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化学成分体系及长、短种类，笔者认为汉代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玻璃

〔1〕 黄今言、陈晓鸣《汉代贩运贸易略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9页。

耳珰制作体系：铅钡玻璃耳珰制作体系和钾玻璃耳珰制作体系，两种体系在助熔剂使用和造型制作上都有所不同。铅钡玻璃耳珰制作体系生产玻璃耳珰数量多，造型种类丰富，规模相对较大，生产的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以短玻璃耳珰为主，普遍较短。钾玻璃耳珰制作体系生产玻璃耳珰数量少，目前仅见收腰圆筒形一类，以长玻璃耳珰为主，生产规模较小。

地区间不同的玻璃耳珰种类、收腰圆筒形玻璃耳珰长度及化学成分体系特征等，反映出各地区不同的玻璃耳珰生产、交流面貌。基于已有数据，黄河中上游为铅钡玻璃耳珰制作体系的中心区域，西汉时已初具规模，东汉时扩大，而钾玻璃耳珰和长玻璃耳珰的制作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和岭南地区，西汉以后才形成一定规模。作为汉王朝政治经济中心所在，黄河中上游的玻璃耳珰产品及相关制作对其他地区的输出与影响相对较强。值得注意的是，黄河上游包金玻璃耳珰的发现，说明我国汉代可能生产过包金玻璃器。已检测的玻璃耳珰数量有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完善对我国汉代玻璃耳珰制作传播及我国古代玻璃制造技术的认识。

玻璃耳珰的传播范围及流行地区与王朝政治经济力量、地区经济发展及人群喜好等密切相关。总体来看，西汉至东汉时期，随着汉王朝中央政权统治的加强及社会工商业的发展，人员流动及商贸交流变得频繁，玻璃耳珰生产、传播规模扩大，使用趋于普遍，在我国中、东部区域盛行起来，同时，玻璃耳珰的流行种类趋于一致，区域性差异缩小。

[作者单位：任昱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生)；

温睿，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责任编辑：袁怡然)